

阿拉伯国家联盟安全治理路径的变迁及动因^{*}

陈丽蓉

摘 要：阿拉伯国家联盟安全治理的方式、路径以及效力受到国际秩序变动的深刻影响。冷战结束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走向兴盛，在其价值理念和安全观念的渗透下，阿盟开启了效仿西方模式的安全治理改革之路：将决策机制由“一致同意”改为“三分之二多数”；将人权价值规范融入治理理念；使用经济制裁和军事手段实现治理目标。然而，自中东剧变以来，阿拉伯世界动荡局势愈演愈烈、阿盟权威遭遇重创等迹象表明，效仿西方的改革之路行不通。由此，阿盟开始回归本土传统，重申不干涉内政和国家主权原则，强调斡旋调解，同时聚焦发展问题，致力于推进阿拉伯国家团结，积极构建安全治理新框架。在国际权力格局深刻变动尤其是“全球南方”兴起的背景下，域外力量走向多元化、阿拉伯国家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新型安全理念得以落地实践，这为阿盟打破西方“迷思”、调整安全治理路径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支撑和物质基础。

关键词：阿拉伯国家联盟；安全治理；“全球南方”

作者简介：陈丽蓉，博士，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西安710064）。

文章编号：1673-5161(2025)05-0083-22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阿拉伯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研究”（24CSS047）及中央高校科研项目“2011年以来阿拉伯左翼发展态势研究”（300102165604）的阶段性成果。

中东是对国际秩序变动高度敏感的地区。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自 1945 年成立以来,其安全治理角色始终随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而动态演进。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权力格局与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强劲动能。在此背景下,阿盟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正经历着新一轮深刻变革。这种深刻变革体现在:近十余年来,通过实践与自主探索,阿盟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形成的安全治理模式予以修正,开始向本土回归,走出了一条更符合阿拉伯国家现实需求的治理新路径,在加强内部协调、推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展现出日益增强的自主性与适应性。

目前有关阿盟的研究侧重于从批判的角度分析其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通过个案分析来剖析其对地区冲突和争端的治理以及存在的问题,^①而对阿盟安全治理的变迁演进及动因缺乏细致研究。本文尝试从历史视角梳理阿盟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揭示国际秩序变革尤其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与其安全治理体系最新变革的内在关联。

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阿盟对西方安全治理模式的效仿

阿盟由 22 个阿拉伯国家构成,既是阿拉伯民族团结的重要象征,又是阿拉伯人表达立场和诉求的重要平台。其成立是地区政治和世界政治双重作用的结

^① 陈万里、赵军:《阿拉伯国家联盟决策机制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 年第 6 期;陈万里、赵军:《试论阿盟决策制度与阿拉伯一体化的发展》,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 年第 2 期;毕健康:《结构与建构视角下阿盟安全治理绩效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 年第 5 期;陈丽蓉:《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其安全治理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年版;Ahmed M. Gomaa, *The Foundation of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Wartime Diplomacy and Inter-Arab Politics, 1941-1945*, Oxford: Longman Group Ltd., 1977; Robert W. Macdonald,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A Study of the Dynamics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Hussein A. Hassouna,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and Regional Disputes: A Study of Middle East Conflicts*, New York: Oceana Publication, 1975; Marco Pinfari, “Nothing but Failure? The Arab League and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as Mediators in Middle East Conflicts,” *Working Paper at Crisis Research Centre*, No. 2, 2009; Pinar Akpinar, “The Limits of Mediation in the Arab Spring: The Case of Syr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7, No. 12, 2016; Farah Dakhllallah,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and Regional Security: Towards an Arab Security Communit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9, No. 3, 2012.

果,一方面,由于奥斯曼帝国境内泛突厥主义兴起,阿拉伯人萌生出通过振奋阿拉伯民族来实现阿拉伯地区自治的强烈愿望,民族意识的觉醒是阿盟成立的重要驱动力;另一方面,英国为避免曾被其背弃承诺的阿拉伯国家倒向法西斯势力,转而支持阿拉伯人建立更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甚至建立阿拉伯联邦或实现政治统一。^①但在“委任统治”中,已被事实分立的阿拉伯国家一旦成立便形成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本能,这极大影响了阿盟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架构。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沙特、也门这7个创始成员国经过协商和权衡,制定了维护成员国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安全治理领域,阿盟注重充分发挥秘书长的作用,通过斡旋、调解来化解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强调“在阿拉伯框架内”解决阿拉伯问题,形成了具有鲜明阿拉伯特色的治理路径。但这一安全治理模式在冷战后遭到来自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念的严峻挑战。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随着美国成为世界单极霸权而逐步推广至全球。该秩序强调“价值一元化”,垄断了对政府组织形式、人权观念及生活方式等各种价值理念的解释权,将冷战胜利归功于西方的“制度优势”,不断渲染其价值观的普世性,如对主权原则的重新解释以及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等;在安全秩序层面,奉行“二元化”的排他性安全霸权,通过营造“我们”和“对手”的对立语境,组建军事同盟集体,确立以美国为核心、具有排他性的绝对安全。^②随着这一以价值一元性和权力逻辑为核心特征的霸权等级秩序开始主导国际秩序时,阿盟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由于未能化解1990年伊科危机和阻止海湾战争爆发,阿盟被打上“失败”的标签。面对挫折和质疑,阿盟汲取了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经验,按照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盛行的思想观念,从决策机制、价值理念规范和治理方式上进行多维转型。

(一) 改革决策机制和组织机构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转有助于创造有序

^① Caesar E. Farah, “The Dilemma of Arab Nationalism,” *Die Welt des Islams*, Vol. 8, No. 3, 1963, p. 143.

^② 杨卫东:《“自由国际秩序”的正义性缺陷与合法性危机》,载《人民日报·学术前沿》2024年第9期,第94-95页。

的世界秩序,解决冲突,促进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表决机制是影响国际组织决策效率和行动能力的重要因素。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由于对国家主权原则的高度重视,国际组织皆采取全体一致表决制,国际联盟实行的即是此种表决机制。^① 早于联合国成立的阿盟在没有其他表决机制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也采取以维护国家主权原则为核心特点的一国一票全体一致表决制。但这一表决机制长期遭到诟病,被认为是限制阿盟的主要因素,因而阿盟于 2005 年修改宪章,将其改为“三分之二多数”决策机制。

此外,阿盟还受到与其邻近的欧盟和非盟的影响。1993 年成立的具有超国家性质的欧盟长期被视为是区域一体化的成功典范,其体制模式和制度框架被认为是欧盟高效运行的主要因素。^② 在“制度至上论”的影响下,阿盟致力于改善其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于 2005 年成立阿拉伯议会,试图通过加强与阿拉伯民众的联系,来提升其影响力和行动能力。非盟对阿盟的影响也不可小觑。2002 年成立的非盟在维护非洲内部的和平与安全、促进非洲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在安全治理层面进行了重要的制度改革,即于 2003 年建立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将其作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核心支柱。^③ 阿盟积极借鉴非盟在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自主性方面所做出的制度安排,于 2009 年 3 月 2 日成立阿拉伯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意在以更为制度化的冲突管控和解决机制,补充阿盟传统的主要取决于秘书长影响力的争端解决方式。^④

(二) 接受人权价值规范为安全治理的原则

维护成员国主权、不干涉成员国内政是阿盟进行安全治理的主要原则,斡旋调解是阿盟治理阿拉伯冲突的主要手段。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推行其全球扩张战略,利用联合国因卢旺达大屠杀事件而提

① 陈海明、仲霞:《国际组织的投票表决与协商一致决策机制》,载《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第 80 页。

② 兰天:《欧盟制度效率分析》,载《国外社会科学》2007 年第 3 期,第 26 页。

③ 张凯:《非洲安全制度治理的转型与结构性困境》,载《国际论坛》2022 年第 5 期,第 103 页。

④ 毕健康:《结构与建构视角下阿盟安全治理绩效研究》,第 35 页。

出保护人道主义和执行“保护的责任”的契机,^①衍化出“国家主权有限”等诸多理论,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保护”和“新干涉主义”,并以其人权观念来曲解“保护的责任”。^②在西方的长期渗透下,阿盟逐渐受到人权叙事话语的影响,其安全治理原则和手段均受到来自西方人权价值规范的严重冲击。

2010年底中东剧变发生后,阿盟史无前例地打破了长期坚持的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2011年2月中旬,利比亚大规模抗议示威运动迅速演化为内战。同年2月22日,阿盟召开紧急会议后发表声明,“鉴于近日利比亚因抗议活动引发流血冲突,会议决定暂停该国参加阿盟及其所有附属机构会议的资格,直至其对本国人民的诉求予以回应。”^③随着利比亚局势持续恶化,同年3月12日,阿盟再次通过决议,邀请联合国安理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和安全区,以保护利比亚平民。这是阿盟首次让外部力量介入成员国内部事务。阿盟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希沙姆·优素福(Hesham Youssef)指出,“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实际上阿盟也是如此”“阿拉伯世界正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些原来不可能出现的做法出现了”“有必要遵守国际人权法,结束对利比亚人民的罪行”。^④

随着阿盟通过决议,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最终打消顾虑,于2011年3月15日做出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⑤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表示,“阿盟的决定带来了‘意见的巨大转变’,原先不愿或反对(介入)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现在愿意讨

①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January 12, 2009, pp. 8-9, https://reliefweb.int/report/bosnia-and-herzegovina/implementing-responsibility-protect-report-secretary-general-a63677?gad_source=1&gclid=EAIaIqobChMI98iv1tzNhQMVM6NmAh0sbQyWEAAYASAAEgKEPvD_BwE, 上网时间:2024年10月12日。

② 陈丽蓉:《西方国家消解阿拉伯国家主权的理论、实践及影响》,载《国际研究参考》2020年第6期,第29~30页。

③ 李来房、冯康:《阿拉伯国家联盟中止利比亚与会资格》,新华网,2011年2月23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11/02-23/2861187.shtml>, 上网时间:2025年7月28日。

④ Dina Ezzat, “League Bows to Arab Popular Will, Calls for No-Fly Zone over Libya,” *Ahram Online*, March 13, 2011,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2/8/7581/World/Region/League-bows-to-Arab-popular-will,-calls-for-nofly-.aspx>, 上网时间:2025年7月28日。

⑤ Josh Rogin, “How Obama Turned on a Dime Toward War,” *Foreign Policy*, March 18, 20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03/18/how-obama-turned-on-a-dime-toward-war/>, 上网时间:2025年7月28日。

论其可能性。”^①2011 年 3 月 18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1973 号决议,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强制执行禁飞,以帮助保护平民,^②这为北约军事入侵利比亚提供了依据。

尽管阿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Amr Moussa)和阿拉比(Nabil Elaraby)对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的立场最初都具有“保护平民”的美好初衷,阿盟对其采取的措施也主要是阿盟内部海合会国家主导的结果,但是不能忽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阿盟及其秘书长对主权和人权认知变化的影响。部分阿拉伯精英“为效仿在人权保护领域拥有先进经验的欧洲、非洲和美国,推动创建了阿拉伯人权法庭。该法庭由阿盟担任主管机构,阿盟理事会第 573 号决议对此予以明确。”^③阿拉比曾为国际法院法官,长期关注社会公正与民生问题,主张变革,信奉保护人权的价值理念。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时任阿盟秘书长的阿拉比在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会谈时明确提出,叙利亚政府必须“停止武力镇压、释放政治犯、推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他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解决叙利亚问题不能依赖叙政府从内部自主推进民主改革,而需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实施外部干预。”^④阿拉比这一立场对阿盟后续在叙利亚的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使用经济制裁和军事武力来实现安全治理目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自助逻辑”和“零和博弈”思维出发,信奉传统安全观,倾向于“以武力促和平”,依靠军事联盟培养代理人,组建排他性集团,形成非此即彼的敌我对垒。^⑤在西方国家这一传统安全理念的影响下,阿盟在 1990 年后逐渐放弃了斡旋调解的传统手段,转向军事化。“1990~

^① Luke Glanville, “Intervention in Libya: From Sovereign Consent to Regional Cons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4, 2012, p. 333.

^②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973(2011)号决议,联合国官网,2011 年 3 月 18 日, [https://docs.un.org/zh/S/RES/1973\(2011\)](https://docs.un.org/zh/S/RES/1973(2011)),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28 日。

^③ “Human Rights,”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Human Rights*, May 26, 2014, p. 3, <https://www.nihr.org.bh/en/MediaHandler/GenericHandler/documents/download/15-%20Edition%202008%20-%20English.pdf>, 上网时间:2025 年 8 月 4 日。

^④ Scott Macleod, “I Don’t Have A Crystal Ball,” *The Cairo Review of Global Affairs*, May 15, 2011, <https://www.thecaireview.com/q-a/i-dont-have-a-crystal-ball/>, 上网时间:2025 年 8 月 4 日。

^⑤ 孙德刚、马雨欣:《域外大国的中东安全治理观:一项比较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7 页。

1991 海湾战争持久地改变了(阿盟)的发展方向,其将军事化引入外交方式。伊拉克令人瞠目结舌的侵略和沙特同样令人惊讶地召唤美军,为(阿盟)这一历史性地变化提供条件”。^① 这一发展趋向在 2010 年以来的中东剧变中得到强化。和对利比亚一样,阿盟对叙利亚采取了除吁请设立“禁飞区”之外的类似举措。2011 年 11 月,在调停失败后,阿盟中止了叙利亚成员国资格,还对叙利亚进行严厉制裁,其中包括对叙利亚高官发布旅行禁令,禁止各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中央银行进行交易,不得与叙利亚政府进行商业贸易。^② 阿盟试图通过制裁和强硬施压来“迫使叙利亚政府结束对民主抗议运动长达 8 个月的镇压”。^③

总之,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价值理念和安全观念的渗透下,阿盟走上了一条专注于决策机制和与西方模式接轨的改革之路。其改革逐渐从决策机制、组织机构进入到指导思想领域的深水区,并在对叙利亚和利比亚内战的治理中达到高潮。然而,事实证明,阿盟紧跟“国际潮流”的做法不仅没有使其走出低谷,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其影响力。对于阿盟来说,如何避免盲目地接受西方“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保护”和“保护的责任”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念,创新安全治理方式,是其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中东剧变后阿盟安全治理路径的本土化

阿盟在中东剧变中强势介入以平息战火、保护利比亚与叙利亚民众安全的举措,意外招致外国军事干涉,致使“阿拉伯国家国内问题国际化”,阿拉伯世界动荡局势愈演愈烈,阿盟权威亦遭遇重创。经历此番阵痛后,阿盟主动求变,再度开启自我革新与战略调整的进程。

^① Mohammad-Mahmoud Ould Mohamedou, “Arab Agency and the UN Project: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Between University and Region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7, No. 7, 2016, p. 1225.

^② Zeynep Şahin Mencütek, “The Rebirth of a Dead Organization? Questioning the Role of the Arab League in the ‘Arab Uprisings’ Process,” *Perceptions*, Vol. XIX, No. 2, 2014, p. 98.

^③ “Arab League Approves Syria Sanctions,” *Al Jazeera*, November 28, 2011,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1/11/28/arab-league-approves-syria-sanctions>,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28 日。

（一）重申国家主权原则,重返斡旋和调解的传统路径

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原则,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阿盟的重要宗旨。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内战发生的频率增多,因战争而产生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出现,强调人权保护无可厚非,但保护人权和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绝非对立,保护人权并不意味着介入国家内政,甚至是推动国家政权更迭。就“保护的责任”而言,根据联合国文件,“保护的责任”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国家负有保护的首要责任;第二,着重发挥预防在成功执行保护的责任中的关键作用;第三,在决定和执行最合适的行动时,必须完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条款,采取宪章第 7 条所述的行动时必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① 可见,联合国所说的“保护的责任”有明确的条件限定,即国家负有主要责任、预防是主要措施。冰岛常驻联合国代表居纳尔·保尔松(Gunnar Pálsson)指出,“‘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的核心应该是救助生命,而不是一张可以准许对他国实施非法、任意干涉和侵略的执照”。^② 可见,联合国的官方文件为处理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内乱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提供了行为依据。对于阿盟来说,其安全治理不仅需要保护人权,还需要维护国家主权,不可偏废其一。充分提高积极预防和救助的能力,是阿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的必备条件。

此外,成功调解冲突并推动各方和解,是保护人权、防范人道主义灾难、维护成员国政治秩序与稳定的基石。在中东剧变之前,阿盟执行的安全治理策略主要以斡旋和调解为主,侧重于政治解决。实践证明,此种安全治理策略符合阿拉伯世界解决冲突的传统,有利于将冲突规模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尽管在部分冲突中,由于外部势力的介入,阿盟调解的有效性较低,但对于一般冲突,阿盟的调解相对有效,对防止处于冲突中的成员国出现政权更迭和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发挥作用。事实上,在采取错误策略介入叙利亚和利比亚内战后,阿盟已认识到了以人道主义保护为由介入成员国内政的消极影响。2022 年 2 月,阿盟秘书长盖特在访问约旦期间,回答媒体提问“当年冻结叙利亚成员国资格是否是个错

^①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January 12, 2009, pp. 8–9, <https://www.refworld.org/reference/themreport/unga/2009/en/64691>, 上网时间:2024 年 10 月 14 日。

^② 《联大举行全体会议讨论“保护的责任”》,联合国官网,2009 年 7 月 28 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09/07/116672>, 上网时间:2024 年 8 月 14 日。

误”时,盖特回答称,“一些阿拉伯国家的许多行为并不合适,有时意见混乱前后矛盾,最终导致了这种局面,有时是仓促行事,以并不合适的方式提交给安理会和联合国……”。^①

从阿盟秘书长的表态可以看出,阿盟谨慎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和军事行动在内的强硬行动,以斡旋调解为主的政治解决策略和不干预成员国内政原则重新成为阿盟安全治理的首要原则。另外,阿盟更加注重在冲突未升级为大规模战争前积极行动,与各成员国协商,致力于形成共识,支持成员国加入斡旋和调解行动,从而将冲突的危害和战争风险降至最低。

(二) 聚焦发展问题,凝聚发展共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阿盟陷入安全治理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阿盟未能贡献思想力量,弥合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观念分歧,解决阿拉伯国家的现实需求。根据国际组织学理论,满足成员国的利益需求是一个国际组织获得持久生命力和活力的基本条件。反过来,“国际组织制定的规则、原则和价值标准也可以重塑国家利益,使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实现共赢”。^②

当前,改善经济状况,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转型已经成为阿拉伯国家的共同诉求。这为阿盟发挥作用提供重要着力点。例如,阿联酋提出了“2021愿景”、卡塔尔提出了“2030国家愿景”、科威特提出了“2035愿景”、阿曼提出了“2040愿景”等,^③其中以沙特的“2030愿景”和埃及的“埃及2030愿景”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瞩目。埃及在其“2030愿景”中明确提出,“重视深化与海合会的战略合作关系,加强发展与其他阿拉伯东西两侧国家的双边关系,支持邻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及其领土完整”。^④作为阿拉伯大国,埃及致力于推动

^① 孙瑛:《叙利亚“回归”阿盟路难行》,环球网,2022年3月3日,http://www.news.cn/globe/2022-03/03/c_1310483042.htm,上网时间:2022年3月9日。

^② 张丽华主编:《国际组织概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6-197页。

^③ Frédéric G. Schneider, “The Stalling Visions of the Gulf: The Case of Saudi Arabia’s Vision 2030,” *Fikra Forum*, May 14, 2021, p. 1.

^④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Egypt’s Vision 2030,” *Arab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Portal, Ministry of Planning, Monitoring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 of Egypt*, January 1, 2016, pp. 11-13, <https://andp.unescwa.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9/Sustainable%20Development%20Strategy%20%28SDS%29%20-%20Egypt%20Vision%202030.pdf>, 上网时间:2023年10月21日。

与海合会的战略合作等将为阿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提供重要支撑。

在这一背景下,阿盟采取多项措施来配合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从机制上来看,除了阿盟经济社会理事会外,阿盟还设立了由国家元首直接参加构成的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峰会。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峰会在 2013 年中断后,于 2019 年再度重启。此次召开的第四届峰会聚焦发展问题,达成了 29 项经济计划,并呼吁进一步推进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在此次峰会上,科威特倡议设立总额高达 2 亿美元的科创投资基金。^①

从具体议题上来看,阿盟根据阿拉伯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愿景,紧跟现代科技发展潮流,发起了旨在促进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数字经济共同愿景(Joint Vision for the Digital Economy)。阿盟秘书长盖特在首届阿拉伯数字经济会议发表演讲时提到,“阿拉伯国家致力于加强全面合作,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将数字经济作为核心议题,说明阿拉伯地区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样,已深刻意识到现代科技带来的挑战,阿盟致力于和其他地区保持同步发展速度,始终为激活阿拉伯联合行动体系,提高阿拉伯联合行动能力而努力。阿拉伯国家已成为世界上首个在地区层面制定网络治理路线图的区域国家集团”。^② 2021 年,阿盟同中国发表《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共同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和网络空间治理。此外,阿盟经济社会理事会持续推动建立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促进阿拉伯经济一体化。^③ 可见,阿盟一以贯之地致力于建立阿拉伯共同市场和经济共同体,促进阿拉伯经济合作,并且与时俱进地推出新发展议程。

更重要的是,阿盟把推动阿拉伯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举措逐步与安全稳定问题结合起来。一方面,阿盟在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中明确提出,重视并赞赏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重视各项发展问题,愿共同推进全

① Arwa Ibrahim, “Beirut Summit: Arab Leaders Agree 29-Item Economic Agenda,” *Al Jazeera*, January 20, 2019,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19/1/20/beirut-summit-arab-leaders-agree-29-item-economic-agenda>, 上网时间:2023 年 10 月 21 日。

② Rabi Al-Thani, “Arab League Launches Joint Vision for Digital Economy,” *Asharq al-Awsat*, December 16, 2018, <https://english.aawsat.com/home/article/1508256/arab-league-launches-joint-vision-digital-economy>, 上网时间:2023 年 10 月 23 日。

③ “Arab League Meeting Discusses Facilitation of Free Trade Zone,” *Arab News*, December 11, 2023,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423901/business-economy>, 上网时间:2023 年 10 月 21 日。

球发展倡议重点领域合作;另一方面,2023年阿盟峰会发布《吉达宣言》,强调阿拉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指出阿拉伯世界经济合作一体化进程将加快经济增长,提高安全水平,促进稳定,维护和平,提升人民的福祉。^① 实现发展,解决经济民生问题是阿拉伯国家当前的最大关切,也是阿拉伯各国的共识和共同利益所在,阿盟采取多种措施满足成员国对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是阿盟增强影响力,走出治理困境的重要条件。

(三) 致力于推进阿拉伯国家团结,构建安全治理新框架

随着阿拉伯国家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积极推行多元化的平衡外交,^②阿盟成为阿拉伯国家表达立场的重要平台,同时阿盟也在这一过程中重塑安全角色。

第一,阿盟支持沙特和伊朗实现和解,共同促进地区安全与和平。沙特和伊朗同为中东地区大国,在地区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是叙利亚、也门、伊拉克、黎巴嫩等多个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一方。中东剧变后的十年,“沙特与伊朗展开地区影响力竞争,介入中东几乎所有热点问题”。^③ 可以说,沙伊关系在中东具有全局性和基础性影响,两国关系的变动直接关涉地区和相关国家的战与和。双方激烈的战略博弈曾使阿盟陷入冲突内外联动的安全治理困境。随着沙特和伊朗在中国的斡旋下实现和解,阿盟面临的安全环境得到改善。2023年吉达峰会上,阿拉伯国家“赞扬阿曼和伊拉克为促进沙特和伊朗对话而在2021至2022年间做出的努力,以及中国在推动利雅得和德黑兰进行谈判并签署恢复外交关系协议方面做出的努力”。^④ 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强调了与伊朗发展合作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与伊朗的和解有利于加强地区的安全与和平。与此同时,阿盟还确立了与伊朗交往的原则,即睦邻友好、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干预阿拉伯国家内

^① “Jeddah Declaration: Arab Leaders Affirm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Joint Arab Action Based on Common Foundations, Values, Interests and One Destiny,” *Saudi Press Agency*, May 19, 2023, <https://www.spa.gov.sa/en/47e1778aaao>, 上网时间:2023年10月24日。

^② 唐志超:《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环境塑造与秩序重建》,载《西亚非洲》2024年第2期,第7页。

^③ 牛新春、李绍先:《乘势而上: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复交及其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3期,第43页。

^④ “Arab League States Advocate Cooperation with Iran Based on Principle of Non-Use of Force”, *TASS*, May 20, 2023, <https://tass.com/world/1620313>, 上网时间:2024年1月8日。

部事务的原则。作为表达成员国集体意志的平台,阿盟的表态意味着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上达成了共识,这有利于构筑新的地区安全框架。

第二,阿盟确认叙利亚回归阿拉伯“大家庭”,推进阿拉伯国家团结。2023 年 5 月 7 日,阿拉伯国家外长在开罗召开的阿盟外长特别会议上投票,赞成接纳叙利亚重返阿盟,结束了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长达 12 年的孤立状态。尽管卡塔尔、摩洛哥等部分阿拉伯国家在投票表决时缺席或弃权,但并没有改变叙利亚重返阿盟的大趋势。当阿盟秘书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及阿萨德是否参加沙特举办的吉达峰会时,说道:“叙利亚是阿盟成员国,从今晚开始,如果主办国沙特发出邀请,他愿意的话就可以来参加。从明晚开始,他们有权出席任何会议”。^① 在面对欧盟、英国尤其是美国的反对时,埃及外长舒克里指出,“这是一个阿拉伯问题,关系到一个饱受十多年内部冲突困扰的阿拉伯国家,我们必须为眼前的局势找到解决办法”。^② 2023 年 5 月 19 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自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首次出席阿盟峰会并发言。叙利亚的回归说明阿盟仍是阿拉伯国家解决问题的重要渠道,诉诸外交和形成“阿拉伯主导的政治解决方案”^③ 正成为阿盟和阿拉伯国家解决危机的主要方式,阿拉伯共同事业获得一定发展势头。

第三,推动阿拉伯国家间的防务合作,提升维护安全的能力。防务合作是阿盟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方式。近十年来,阿盟因应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出现的安全挑战,开创了新的防务合作形式。其一,开展多国联合军事演习。2018 年,埃及、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和约旦 6 国举行名为“阿拉伯盾

^① “Arab League Brings Syria Back into Its Fold After 12 Years,” *Al Jazeera*, May 7, 2023,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5/7/arab-league-agrees-to-bring-syria-back-into-its-fold>, 上网时间:2024 年 2 月 21 日。

^② Ikram Kouachi, “Egypt Says Syria’s Return to Arab League Does Not Entail Full Normalization,” *Anadolu Agency*, May 10, 2023, <https://www.aa.com.tr/en/africa/egypt-says-syrias-return-to-arab-league-does-not-entail-full-normalization/2893825>, 上网时间:2024 年 2 月 21 日。

^③ Marita Kassis, “Syria’s Return to the Arab League Raises New Questions,” *Diplomatic Courier*, May 15, 2023, <https://www.diplomaticcourier.com/posts/syrias-return-to-the-arab-league-raises-new-questions>, 上网时间:2024 年 2 月 23 日。

牌”(Arab Shield)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是阿拉伯国家首次开展的多边军事演习,在建立阿拉伯联合防御体系和阿拉伯集体行动机制上迈出重要一步,将提高阿盟国家解决因外部干涉引发的阿拉伯国家内部冲突的能力。^①其二,推动情报共享。2021年2月,阿拉伯情报论坛在埃及成立,阿盟秘书长盖特出席开幕式。该论坛成立的目的是除了打击恐怖主义、洗钱和人口贩卖外,还致力于通过情报合作,提高由于域内外大国干涉而陷入内部冲突的阿拉伯国家的危机应对能力,维护阿拉伯国家安全,建立阿拉伯世界安全机制。^②此外,阿盟还于2023年成立阿拉伯网络安全部长理事会,^③以提升安全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综上,阿盟聚焦安全与稳定,支持沙特和伊朗和解,就叙利亚、利比亚、苏丹、也门等热点问题做出诸多安排,明确提出反对外部干涉,要求在地区安全事务上发出“阿拉伯声音”,展现阿拉伯国家的集体立场,这与阿拉伯国家在新形势下坚持战略自主相得益彰。

三、阿盟安全治理路径再次变革的动因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其鲜明特点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势力相对衰退,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建立在非多极化格局基础上的战后国际秩序”^④逐渐松动,一个不以西方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时代正在到来,从多个维度推动了阿盟安全治理路径的再次变革。

(一) 域外大国力量的多元化为阿盟变革提供空间

阿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角色深受国际格局变迁的影响。冷战期间,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使阿盟赢得了较大的自主空间。例如,1958年黎巴嫩危机爆发

^① Ahmed Eleiba, “Arab Shield: The Largest Joint Arab Military Drills to Date,” *Ahram Online*, November 14, 2018,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316329/Egypt/Politics-/Arab-Shield-The-largest-joint-Arab-military-drills.aspx>, 上网时间:2024年2月23日。

^② Marwa Yahya, “New Analysis: Arab Intelligence Forum Helps Protect Arab National Security,” *Xinhua*, February 10, 2021,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2/10/c_1397-33726.htm, 上网时间:2024年2月24日。

^③ Dhah Al Mutairi, “Arab League Announces Establishment of Council of Ministers for Cybersecurity,” *Arab News*, September 11, 2023,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371501/saudi-arabia>, 上网时间:2024年2月24日。

^④ 王健:《“全球南方”崛起与国际秩序新变化》,载《西亚非洲》2023年第6期,第6页。

时,苏联在牵制美国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军事干涉的同时,还向联合国提交“呼吁华盛顿和伦敦‘毫不拖延地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军队’”的提案。由于联合国大会未能就此达成共识,阿盟最终成功主导了危机解决进程,其提出的决议草案在联合国大会获得一致通过。^①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建立单极霸权,通过“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解构阿拉伯国家体系,“竭力阻止阿拉伯国家建立任何阿拉伯集体行动机制”,^②阿盟的自主性不断减小,组织协调能力急剧下滑。在强大外力的裹挟下,阿盟踏上了将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念与实践融入其安全治理的道路。

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动为阿盟再次改革安全治理体系提供空间。第一,随着美国实力相对衰退,减少对中东的资源投入,阿盟获得进行安全治理变革的良好外部条件。从奥巴马开始,尽管美国不同总统领导下的政府采取的策略不同,但从中东“战略收缩”的根本趋势没有变化。例如,奥巴马政府与伊朗签订核协议,加大对巴以双方“劝和促谈”的力度,其目的是在减少对中东投入的同时,提高美国在中东的软实力。特朗普政府为进一步减轻在中东的安全负担,提出由海合会以及埃及和约旦创建“中东战略联盟(Middle East Strategic Alliance, MESA)”,组建由美国领导的“阿拉伯北约(Arab NATO)”,使其“成为反对伊朗侵略、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堡垒。”^③拜登政府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西方“普世价值观”为基础,以增强美国的影响力和塑造力为目标,制定了一套以平衡、折衷为特点的中东政策。^④ 美国既要减少投入,又要重塑领导地位,这种投入与目标的巨大鸿沟使越来越多阿拉伯领导人认识到美国治理中东能力和意愿的下降。加沙冲突、红海危机等又进一步验证了美国的功利主义务实外交及其霸权短板,因而阿拉伯国家开始寻找新的安全治理路径,阿盟在这一过程

① Tawfig Y. Hasou, *The Struggle for the Arab World: Egypt's Nasser and the Arab League*, London: KPI, 1985, p. 101-103.

② Michael C. Hudson, *Middle East Dilemma: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Arab Integ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8.

③ Andrew Miller and Richard Sokolsky, “Arab NATO: An Idea Whose Time Has Not (and May Never) Come,” *Lobe Log*, August 21, 2018, <https://lobelog.com/arab-nato-an-idea-whose-time-has-not-and-may-never-come/>, 上网时间:2022年1月20日。

④ 孙德刚、杨影淇:《论当前美国中东政策中的折衷主义》,载《国际观察》2024年第4期,第59页。

中被给予了更重的分量。

第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支持阿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获得更高的自主权。“全球南方”国家均有被殖民化和追求非殖民化的共同历史记忆,其在当前的国际社会秉持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维护国家主权,强调国际公平和正义,“反对全球北方的剥削与扩张,对干预政策特别是美国的制裁极其反感;追求和平,不愿意卷入冲突和战争;认同价值多元化,不强求一种价值观或利益诉求”,^①致力于通过合作与互助来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和同行者,“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支持阿方运用阿拉伯智慧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难点问题,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为中东建立政治互信和安全机制指明了方向。”^②这为阿拉伯国家的独立自强和阿盟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有力的外部保障。

(二) 阿拉伯国家加强战略自主有利于阿盟推动变革

长期以来,位于“边缘”的中东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受到西方大国的控制和干预,处于对西方的依附地位。尽管阿拉伯国家竭力摆脱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但始终难以突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缔造的藩篱和打造的围困墙。随着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动和“全球南方”崛起,阿拉伯国家获得谋求战略自主的良好机遇,为阿盟再次改革安全治理体系提供契机。

第一,阿拉伯国家战略自主性的日益增强为阿盟改革注入一定动力。无论是2015年奥巴马不顾海湾阿拉伯盟友的担忧执意与伊朗签署伊核协议,还是2019年特朗普对沙特石油设施遇袭未采取实质性行动,^③抑或是拜登因卡舒吉事件公开斥责沙特为“贱民国家”,并以干预也门内战为由停止对沙出售进攻性武器,^④作为美国盟友的阿拉伯国家日益沦为华盛顿制衡伊朗及应对中俄大国博

^① 李安山:《世界秩序变革中的“全球南方”——基于历史发展的视角》,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23页。

^② 《阿盟峰会强调加强阿拉伯国家团结合作》,载《人民日报》2023年5月22日,17版。

^③ Mohammed Soliman, “The Gulf’s Quest to Reconfigure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S,”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April 22, 2022,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the-gulfs-quest-to-reconfigure-its-relations-with-the-us>, 上网时间:2025年6月12日。

^④ Tom O’Conner, “Saudi Arabia Is Becoming One of Biden’s Most Important Swing States,” *Newsweek Magazine*, May 28, 2024, <https://www.newsweek.com/saudi-arabia-becoming-one-bidens-most-important-swing-states-1903501>, 上网时间:2025年6月13日。

弈的战略棋子。反过来,安全关切被忽视的阿拉伯盟友也开始重新审视对美关系,顺应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的崛起浪潮,着手调整国家战略。

正如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伯纳德·海克尔(Bernard Haykel)所说:“沙特意识到世界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的单极格局,正在向多极化世界转变,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正在崛起。沙特必须与尽可能多的这些国家保持关系,尤其是这些作为其石油和石化产品主要客户的新兴大国。”^①阿联酋也通过积极发展与中、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合作关系来减小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依赖,^②开展对外合作时更加强调自主性和平衡性。如今,“要求外国停止对阿拉伯事务的干预,不得在阿拉伯国家内部支持组建武装团体和民兵”“寻求消除地区冲突,集中精力实现发展和一体化”“自主决策”^③已成为阿拉伯国家的共识,使阿盟变革治理理念获得直接动力。

第二,阿拉伯国家团结自强,积极构建新的安全合作机制,与阿盟安全治理体系变革形成合力。无论是传统阿拉伯大国埃及还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都将推动经济发展和多元转型作为核心要务,并通过竭力缔造自主安全架构以为其经济转型提供稳固环境。沙特是其中典型代表。在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的主导下,沙特跨越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分歧,不仅与卡塔尔全面恢复外交关系,结束断交危机,还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和平谈判,和伊朗达成和解,“结束长达 7 年的敌对状态和几十年的政治对立”。^④2023 年 5 月 19 日,萨勒曼王储在吉达召开的阿盟峰会上强调,“沙特正朝着和平、合作与发展转变,以服务人民利益和保护国家利益。”^⑤这标志着沙特正在设定自己的议程。沙特的政策选择和动向不仅对沙特自身意义重大,还对阿盟具

① Tom O'Conner, "Saudi Arabia Is Becoming One of Biden's Most Important Swing States,".

② Jean-Loup Samaa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n Search of Strategic Autonomy," *La Fondation méditerranéenne d'études stratégiques*, July 9, 2021, <https://fmes-france.org/the-united-arab-emirates-in-search-of-strategic-autonomy/>,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13 日。

③ Ebrahim Hashem, "Arab Resolve to Focus on Development, Strategic Autonomy," *China Daily*, June 13, 2023,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306/13/WS6487b8d9a31033ad3f7b-be35.html>,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29 日。

④ 邹治波:《世纪和解:沙特和伊朗握手言和的意涵与启示》,中国日报网,2023 年 3 月 15 日,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303/15/WS6411a808a3102ada8b233c89.html>,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22 日。

⑤ Ebrahim Hashem, "Arab Resolve to Focus on Development, Strategic Autonomy".

有重大影响。此举表明,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权力平衡已向海合会国家倾斜,尤其是“沙特获得阿盟领导地位,能够影响其他阿拉伯国家”。^① 历经 10 余年动荡和困顿,阿拉伯国家正翻开新的一页,试图在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通过团结自强找回独立的自我。在 2023 年阿盟峰会上,叙利亚重返阿盟,这显示阿拉伯人决心自主决定其内部事务。^② 《吉达宣言》强调,“可持续发展、安全稳定与和平生活是全体阿拉伯人的固有权利,这些目标需要各成员国协调一致共同努力来实现。”^③ 这与阿盟安全治理理念的复归同频共振。

(三) 新安全理念的实践推动阿盟更重视其传统理念价值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向全球扩展其价值理念,现实主义安全理论和自由主义安全理论为其两大主流理念。前者认为国家间的权力竞争是国际社会本质。其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提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谋求的不是维持权力,就是增加权力,或是显示权力”,因此,通过加强军事力量、结盟等方式实现权力均衡或建立霸权体系是国家保证安全的主要手段。后者一方面认为国际制度可以约束国家行为,为国家间沟通与合作提供渠道,从而增进国际和平,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将民主与和平联系起来,认为民主国家法治水平高,拥有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和负责任的对外政策,^④ 具有共同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

尽管这两种安全理论在具体内容上有差异,但都信奉物质主义,强调武力或实力的重要性。这种以权力思维为底色,信奉实力政治,注重以西方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改造世界其他国家的安全理念客观上带来的是动荡和冲突。冷战结束后爆发的主要冲突,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

^① Maximilian Felsch, “The Ascent of Saudi Arabia to a Regional Hegemon: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Power in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57, Issue 2, 2020, pp. 10–11.

^② Imad k. Harb, “The Jeddah Arab League Summit: MBS’S Final Crowning,” *Arab Center Washington DC*, May 31, 2023,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the-jeddah-arab-league-summit-mbss-final-crowning/>, 上网时间:2025年6月22日。

^③ “Arab League Jeddah Summit’s Final Declaration Emphasizes Unity of Stance on Issues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rab News*, May 20, 2023,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306806/saudi-arabia>, 上网时间:2025年6月22日。

^④ 刘胜湘:《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安全理论及其批判》,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9期,第24~28页。

争,以及俄乌冲突均由美国发动或主导。^① 在中东地区,信奉传统安全观念的西方大国对中东进行渗透和干涉,对地区国家进行操纵、利用和挑拨,导致“中东地区动荡不宁、安全问题异常尖锐,安全秩序无法形成”。^② 实际上,早在 1955 年,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就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提出十项原则,^③对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不过,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体系,这十条准则未能在国际政治中得到有效施行。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极大改变了安全理念知识生产的不平衡状况,形成了一套充分反映南方国家需求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新安全理念,即反对武装干涉、主张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冲突。其与十项原则共同汇聚成了一股促进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推力。中国在联合国多次阐明政治解决危机的一贯立场,支持阿盟在推动冲突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2023 年,加沙冲突爆发后,“全球南方”国家秉持公平正义立场,持续呼吁停火止战,并在联合国框架内积极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2023 年 3 月,在中国的主持与推动下,沙特与伊朗结束敌对状态,实现历史性和解。此举不仅促成中东地区其他热点问题的降温与化解,更以实践证明:对话与合作的冲突解决路径,远优于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对立对抗模式。

国际政治高度关联,新安全理念的逐步推行,为阿拉伯地区通过对话、协作及政治外交途径化解分歧与冲突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政治基础。事实上,阿盟自 1945 年成立之初,就在其宪章中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原则(阿盟宪章第 8 条),强调以斡旋与调解方式解决成员国间争端。但在域外大国的干涉和西方自由主义理念规范的强势影响下,该理念遭到严重破坏。因此,随着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日益深陷危机,“全球南方”兴起,阿盟得以回归更符合阿拉伯世界特点的传统安全治理模式。

(四) “全球南方”兴起为阿盟安全治理变革奠定物质基础

中东是世界上安全赤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阿拉伯国家常年担负巨大的军

① 田文林:《超越西方传统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的时代价值》,载《当代世界》2022 年第 5 期,第 27 页。

② 王林聪:《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12 期,第 17 页。

③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5 年第 6 期,第 222-223 页。

费开支,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自1960年以来,沙特军费支出均超过100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7%,2015年的军费支出高达871亿美元,占GDP比重跃升至13%。^①然而,巨大的安全投入非但未能改善阿拉伯国家的安全环境,反而拖累经济发展,使其陷入停滞与中断。经济疲软引发严峻的民生危机,催生剧烈动荡并迅速蔓延,进一步恶化了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局势,东盟也在这一过程中走向衰微。究其根源,阿拉伯国家与东盟将安全与发展割裂开来,终致顾此失彼。“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②与世界上许多后发展国家一样,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发展是最大的安全,只有发展才可以解决民生问题,使人民摆脱贫困,消除冲突的根源,为许多安全问题的解决奠定最重要的物质基础。^③2016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东盟总部的演讲中再次强调,“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④因此,解开安全困境的谜题不仅需要阿拉伯国家将重心放在发展上,还需要国际环境的支持。“全球南方”的兴起则为东盟和阿拉伯国家提供重要物质支撑。

第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经济崛起为东盟和阿拉伯国家构建新的安全治理体系提供现实可能。经济发展始终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优先项,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实践持续增强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加速世界经济中心南移。据测算,2024年发达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全球占比约为40.2%,而“全球南方”国家占比达59.8%。^⑤2024年1月,埃及、沙特、阿联酋、伊朗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不仅使中东国家发展经济,实现经济多元化转型,提升战略自主性,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有了坚强后盾,还使东盟得以展现独立

^① “Military Expenditure (Current USD)-Saudi Arabia,” *World Bank Group*,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XPND.CD?end=2023&locations=SA&start=1963&view=chart>, 上网时间:2024年12月20日。

^②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第2版。

^③ 韦红、郝雪:《“三大全球倡议”:全球治理新思维及推进路径》,载《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6期,第167页。

^④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第6版。

^⑤ 徐秀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与世界大变局演进方向》,载《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1期,第7页。

于西方的立场。例如,阿盟不顾西方国家的反对,接纳叙利亚重返阿拉伯“大家庭”,^①并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与“全球南方”一道保持中立,拒绝参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的制裁行动。阿盟秘书处战略研究部主任阿拉·阿尔·塔米米(Alaa Al-Tamimi)评论道:“来自中东和非洲的新成员(加入金砖),将有助于金砖国家在团结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制定促进经济合作的国际议程。它是成员国在不同领域进行合作协调的平台”。^②

第二,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为阿拉伯国家提供发展平台,有助于阿盟新安全治理理念落地。阿拉伯国家处于世界经济链条的底端,长期以来扮演着西方发达国家资源来源地和商品市场的角色,经济结构单一,发展动能不足。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从一穷二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阿拉伯国家在发展问题上同频共振。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走在前列,不仅在经贸、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是阿拉伯国家的天然合作伙伴,在新能源、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也与阿拉伯国家具有广大的合作潜能。其次,经历过艰难奋斗岁月的中国深知发展中国家突破现有国际体系重重阻碍的不易,因而愿意采取切实行动,帮助阿拉伯国家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实现产业转型,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正如习近平在阿盟总部发表演讲时所说,“促进中东工业化,开展产能对接行动。产能合作契合中东国家经济多元化大趋势,可以引领中东国家走出一条经济、民本、绿色的工业化新路。中方优势产能和中东人力资源相结合,可以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③最后,通过中阿合作论坛、中阿首脑外交、金砖合作机制等渠道深化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对接,聚焦其促进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迫切需求。“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更为阿拉伯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实现新兴领域追赶创造了重要

① Ishak Benhizia, “Why Arab Countries Are Queuing up to Join Brics,” *Middle East Eye*, August 22, 2023,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arab-countries-brics-queuing-up-join-why>, 上网时间:2024年2月26日。

② Wang Hao, “Arab League Organizes Workshop on BRICS,” *Xinhua*, February 26, 2024, <https://english.news.cn/20240226/d369542cc9ce481385e63f7f7638f128/c.html>, 上网时间:2024年2月26日。

③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

机遇。

总的来说,“全球南方”兴起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和平、合作、共谋发展的声音超越了狭隘排外的冲突文化和等级秩序观,全球治理层面出现新气象。经历剧变之痛的阿拉伯国家逐渐认同“发展促安全”理念,形成发展共识。与此同时,科技实力迅速提升的中国从理念和行动上大力支持阿拉伯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有助于阿盟顺势而为,积极调整安全治理理念。

不过,阿盟在构筑稳固的地区安全框架和安全治理的长效机制上仍然面临诸多难题。其一,国家和政权安全是阿拉伯国家的首要关切,不干涉内政原则是阿盟处理与域内大国关系的首要原则,如何看待存在于多个阿拉伯国家并且与伊朗等国关系密切的非政府武装行为体,影响着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和解进程。例如,2024年1月17日,阿盟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强烈谴责伊朗袭击伊拉克库区首府埃尔比勒(Erbil)的决议。^①其二,尽管阿拉伯国家形成了共同维护安全的共识,但在哪种安全威胁是首要威胁,由哪个国家扮演领导角色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阿盟的集体行动能力,不利于安全领域合作向纵深发展。例如,位于黎凡特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更关心发生在叙利亚、伊拉克的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而位于马格里布的阿拉伯国家更关心利比亚问题和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其三,世界大国的介入与干预仍然阻碍着阿盟发挥其安全治理职能。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尽管阿盟把巴勒斯坦事业置于核心地位,多次召开会议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要求以色列停火,但由于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偏袒和介入,始终未能在制止以色列袭击上发挥有力作用。

四、结语

中东历来是文明的交汇融合地,对外部世界的变化高度敏感。当外部力量强大而中东本土相对衰弱时,中东则受到冲击,成为外来文明的接受者;当外部

^①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Adopts A Resolution Condemning The Iranian Strikes on Erbi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Egypt*, January 17, 2024, <https://mofa.gov.iq/2024/42101/>, 上网时间:2024年3月11日。

势力弱小而中东本土强大时,中东则成为文明的辐射中心。进入近代后,欧美资本主义兴起,通过野蛮暴力的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征服,将中东纳入其构筑的用以维护西方霸权的等级性“现代世界体系”。冷战期间,由于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争夺“在核心地带撕开了一道口子”,中东地区的自主性得到提高,^①但世界很快因为苏联的解体而进入“历史终结”时代,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高歌猛进,实现了对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垄断。中东不仅在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西方的从属地位,还在观念层面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渗透对象。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阿盟一方面因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强势干预而不断边缘化,另一方面遭受着西方“人权高于主权”“保护的责任”等价值规范的巨大冲击。由此,阿盟按照西方已有成功经验进行改革,成为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融入者和参与者。然而,这并未从根本上提高阿盟的安全治理能力,反而使其因对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战处理失当而遭到更大的质疑。

中东剧变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动以及“全球南方”的兴起,为阿盟实现安全治理模式的“纠偏”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2 个阿拉伯国家在经历美式反恐战争和剧变带来的磨难后,形成了发展共识,出现了政治觉醒,战略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全球南方”兴起在经济上为阿拉伯国家将重心放在发展问题上提供广阔空间,在政治上鼓励阿拉伯国家追求独立自主,在全球治理上主张公道正义,在价值上支持多元化,从总体上推动着阿盟不断朝着提升治理性能和影响力的方向前进。对于阿盟来说,排除外部质疑之声带来的干扰,打破对西方已有区域组织制度的“迷思”,切实根据中东地区出现的新形势来探索符合阿拉伯世界特性的安全治理模式,聚焦发展问题、凝聚发展共识、通过外交斡旋和政治调解来解决冲突,是提高治理能力的必备条件。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赵 军)

^① Raymond Hinnebusch and Anoushiravan Ehteshami, ed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4, p. 6.